

我的老师汪泛舟

徐贵祥



我在中学时代，别的功课学得不太好，语文课稍微好一点。初中一年级在姚李中学，语文老师是李成华。李成华老师好像是安庆人，本来是体育老师，但是教我们语文，方法非常灵活，记得他教我们学习毛主席诗词《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还额外地讲了一段他本人童年时期听到渡江战役的炮声，和江边群众支援大军过江的故事，让我很受启发。

初中二年级我回到洪集“戴帽中学”，语文老师是王启昌。那时候课外读物稀缺，王启昌老师不满足课本提供的内容，找了一些课外书，印象很深的是他给我们讲刘知侠的《铺草》和茹志娟的《百合花》，特别是《百合花》，故事主线是文工团员带领小战士到新娘子家借被子的曲折过程，副线是小说里几次出现的小战士肩膀上的破洞，这个破洞意味深长，感情含量饱满，引起了我们丰富的想象。王启昌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尤其甚，前几年创作《老街书楼》，里面的启老师这个形象，就是以王老师为基本原型。

同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我的早期求学经历也很曲折，初中毕业之后，差点儿就没有上学了。以往在邱南部的学生要到几十里外的叶集中学读书。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名叫何长的校长，招兵买马，在姚李镇东南方的一座冈峦上办起了中学。这个学校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老师来自四面八方，有职业中学教师，也有落魄的技术人员，还有下放本地的大学教授和讲师，师资力量雄厚到今天不可想象。

汪泛舟老师就这样成为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个推手。

几十年后，一位乡贤跟我讲，汪泛舟老师本来在六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古代文学功底非常深厚，姚李中学创建初期，何校长四处奔走，把他请到姚李中学，给我们这些灰头土脸的乡下孩子讲先秦文学和唐诗宋词。印象中，汪老师讲起课来确是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也学得津津有味。

有一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是我们高中毕业前夕，汪老师特意给我们讲了一篇古典名著《列子·汤问》中的《薛谭学讴》——“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在我们即将离开校门之际，汪老师给我们上一课，用心良苦，告诫我们，要虚心若谷，脚踏实地，学到真本事。不要只学到一点皮毛，就以自己了不起了。

这一课，让我受益终身。

多年之后我才得知，就在我参军不久，有

一个全国人才调配行动，汪老师在这个大调配中离开了家乡，当时有三个地方供他选择，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还有一个甘肃，汪老师最终选择了甘肃，1982年调入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

五年前，第一次到兰州，我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到《飞天》杂志编辑部看看——这个刊物在我踏上文学创作之路之初，曾经发表过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再有一个就是看看我的老师。原以为老师在敦煌，一打听，老师也在兰州，着实让人喜出望外。

会议主办方听说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老师，也很重视，派了报社的记者何燕，先期到汪老师家里进行采访，何燕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从而得知，汪老师已经在甘肃工作了十七年，生活了四十二年，成就斐然：发表有关敦煌文学(文献、宗教等方面的文章近百篇(含词条)，约130余万字，其《敦煌曲子词的地位、特点和影响》《敦煌讲唱文学语言审美追求》《〈西游记〉源流别考》《敦煌诗词补正与考源》《敦煌道教诗论》等学术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收入并转载，还有部分论文被收入《想像力的世界—20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书中，出版了专著4部。

除此之外，还多次出席“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等且有学术论文交流。参与撰写《敦煌学大辞典》《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学》《敦煌学概论》《中国名人遗迹诗碑联鉴赏辞典》《中国宗教胜迹诗碑联鉴赏辞典》《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全敦煌诗》等大型图书，并任《全敦煌诗》副主编。2020年被授予甘肃省“陇人骄子”的光荣称号。

见面那天，师生都很激动，老师喜悦于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学生仰慕于老师丰富的学术成就，相谈甚欢。

我问汪老师，读高中的时候，我写过一个剧本，请汪老师指点，汪老师除了跟我讲剧本创作的基本规律，还给我推荐了几本书，老师是否还记得。

汪老师说，记不得了，我是搞研究的人，对于创作缺乏深刻的体验，老师教给学生的，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学习的方法，好学生不读死书，贵在悟性。

我说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的确，世界上的学问那么多，在学校读书，能够读到的东西有限，但是老师教给我们学习的方法，启发我们领悟，提高我们的领悟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的。

那次会面，老师还表扬了我，说这些年他一直关注我的成长和进步，他甚至怀疑，那个后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小有名气的徐贵祥是不是他的学生徐贵祥，后来子女告诉他，此徐贵祥就是彼徐贵祥，他很高兴。

我说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从皖西姚李镇东北方的那个山冈上出发的，都有老师的心血。

汪老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作为老师，最大的成就就是看到学生的进步。

我说我永远会记住《薛谭学讴》那一课，我也经常给我的学生讲这一课，不过，我总也讲不出老师传递给我的那种意味，我的学生对这一课的反应没有我对这一课的反应强烈。

汪老师沉思片刻，一本正经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说明，不是你这个老师不如我这个老师，而是你的学生不如我的学生。

我问汪老师，在兰州习惯不习惯，老师说，很习惯，再回老家就不习惯了。我在兰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人生快意足矣。他并且告诉我，虽然他已八十六岁了，精力还很充沛，他还要写两本书，关于敦煌的，关于兰州的。

望着耄耋之年而又精神矍铄的老师，我的心里涌动起无限感动。兰州是一个移民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改革开放之后，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把他乡作为故乡，来到在当时还相对偏远和落后的兰州，建设重工业基地，垦荒开矿，植树造林，发展文化，支农扶贫，才出现了今天这样一个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新型城市。百年前落后贫瘠的面貌已经不再，如今的兰州，黄河穿城而过，两岸树影婆娑。这些遮风挡雨的绿树，是从一代代人的心里生出来的，长起来的。我的老师，就像一棵树，扎根兰州，长在兰州，守护着兰州，美化着兰州。

那次，在兰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座谈会上，我向与会者讲述了汪老师的故事，大家都很感慨。我说，我们来到兰州，不是来做客的，不是来念经的，我们是来认识兰州、亲近兰州、融入兰州的，兰州也是我们的兰州。用我们的热爱作为种子，用我们的情感作为养料，用我们的文字作为阳光雨露，一起来为兰州种一棵树吧，种一棵精神之树、信念之树、理想之树、信仰之树。

兰州行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同家乡、母校、老师和同学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了，期间几次收到汪老师的赠书，深感荣幸。他在扉页上我的名字下面写下的“高足”两个字，让我倍受鼓舞，同时也有几分歉疚。

前几年，师兄喻廷江要我为他的楹联作品集《蓝梦集》写篇文章，在此过程中，很多往事浮现在眼前。据廷江讲，我们姚李中学初创时期，房屋简陋，何校长亲自带领学生挖土割草，修建女生宿舍。汪老师除了教书，几乎没有社交活动，人缘却很好，总是笑眯眯的，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何校长和汪老师等人都很尊重他，从不为难他，只是听说他家庭很困难，生活极其简朴。除了何校长和汪老师等人，还有一个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初中一年级从洪集镇“戴帽中学”转到姚李中学，当时学校有一个“右派”，大家都叫他老戚，因为身份问题，负责种菜，经常看见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的中山装，挑着粪桶，在田间穿梭。等我读了高中才知道，老戚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学老师，在我高中毕业之前，恢复了工作，又站到讲台上去了。

在我的新作《老街书楼》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一群老街孩子终于上了上阳中学，遇到了一个负责看大门和种菜的“何大伯”，在他的暗中支持下，老街孩子掌握了学校图书馆的钥匙。改革开放初期，“何大伯”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上阳中学的校长，并参与了省里的恢复高考方案设计。“何大伯”这个人物不是神来之笔，他是我读高中时期认识的何校长、汪泛舟老师、老戚老师等人的集合体。我感谢我的中学时代，感谢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当年的有心栽花，就没有我今天的无心插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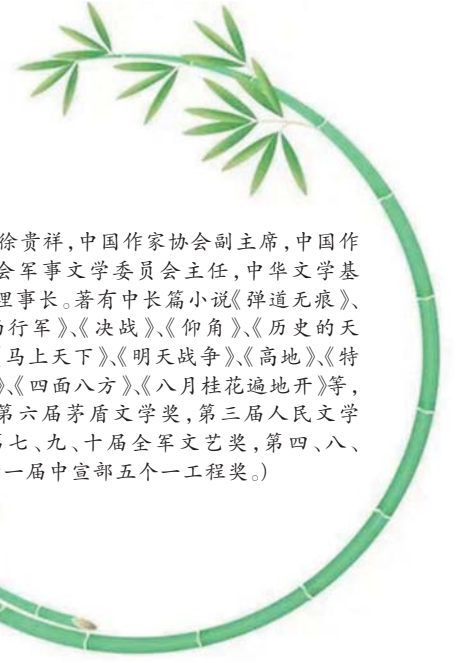
借写这篇文章的机会，我要向我的老师们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卢文芳、王瑞成和初中老师王启昌、李成华、任炎哲等，以及高中语文老师汪泛舟、周培松、朱国泰、陈维德等。除此之外，还有政治老师吴以政和夏清灼，他们教给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让我受益终身。虽然我的理科成绩很一般，我还是记住了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姜兴霖，物理老师吴振琪，化学老师童文新。以后我参军了，进了军校，学军事地形学，学弹道抛物线原理，学运用三角函数确定炮兵射击诸元，之所

以能够得心应手融会贯通，还是得益于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我的基础知识正好够用，未能更好地发挥，不是老师们的错。

闲话少提，还是回到正题上。前不久，汪泛舟老师的儿子、我的高中同学汪治明发来一个信息，跟我讲，家乡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收集整理了汪老师撰写的一部分学术论文和《中国诗词新解》、《敦煌诗解读》、《敦煌石窟借诗校释》、《敦煌古代儿童课本》四部专著，拟出版《汪泛舟文集》。

这个信息让我由衷地高兴，可以说，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功在当代，利在未来，系统地整理出版汪泛舟老师的文集，无论是对于他年轻时效力的家乡，还是他中年后供职的西北，无论是从文化层面讲，还是从文学层面讲，都是功德之举。

据治明兄讲，老师交代，要我作为文集作序。作序不敢当，也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老师多年的心血即将结晶问世，我这个当学生的，确实有话要讲。老师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将继续照亮我的前行之路。



永远的长征 永恒的纪念

——十幅红二十五军长征历史图片的详解(中)

程先超

两张合照背后的故事



1935年8月，甘肃两当，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与警卫参谋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后排左起：宁积贤、廖辉、詹大南、吕清、田崇厚

1935年8月3日凌晨，红二十五军攻克两当县城，8月5日一大早，红二十五军又沿着两当河岸的山道出发了。在这停留的一两天时间里，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领导拍摄了几幅合影照片，可惜的是因为多重原因

就只保存了这两幅，其中上幅由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保存下来，郭述申后来回忆：西征北上途中，我们曾在甘肃两当县城合拍过一张照片，我把它一直带到陕北。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



1935年8月，甘肃两当，吴焕先(左)徐海东(右)合影

时，这张照片由杨尚昆转到斯诺手里，后收入《斯诺眼中的中国》画册。下副由徐海东保存，在照片中可以看到两位青年将领英姿飒爽，蓬勃向上，共同担负起领导红二十五军的职责。

“七仙女”的故事

红二十五军长征队伍里有7名女护士，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仙女”，她们都来自大别山区，她们分别是：周东屏(周少兰)、戴敬敏、余国清(余光)、曾纪兰、张桂香、田喜兰、曹宗楷，实际上这些红军女战士早就经历过严酷革命的血与火考验，她们基本上都是红军家属，活跃在战火纷飞战场上，她们是当之无愧的红军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告别大别山后，军政治部考虑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担心女护士随部队行动不方便，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于是决定让她们留在根据地。

“七仙女”从冒死跑出来参加红军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同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未想过要离开这支队伍。于是，7名女红军找到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请求他收回留下女战士的命令。就在这个时候，一匹战马的蹄声由远而近，徐海东副军长来了，听说此事后便大声说：“快起队伍去！”自此，红二十五军队伍也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果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那血与火的岁月里，7位红军女战士都是历经多重考验，却对革命理想矢志不渝。如戴敬敏，1916年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后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任看护员。一家共有14人参加革命，长征前已有10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中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之初，她的父亲戴雪舫就在掩护学生转移时牺牲；1932年夏，她的哥哥戴敬敏被张国焘以“改组派”的罪名错杀。

而周东屏，原名周少兰。1917年出生在安徽六安，由于家境贫穷，10岁就被送到别人家做童养媳。12

岁时，她逃离当时的家庭，后参加红军并做护理工作。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的雒南县(今洛南)康家河，与敌六十师发生激战。敌人虽被击垮了，但亲临前线指挥的徐海东却负了重伤，一颗子弹穿透左眼，从颈后飞出，顿时血流如注。军医院钱信忠院长实施紧急抢救，总算止住了血，可徐海东的喉咙被血和痰堵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危急关头，17岁的周少兰果断地用嘴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块和浓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徐海东的呼吸终于变得均匀了。在缺医少药的恶劣战争环境里，她日夜看护着徐海东，将炭火烧旺，换绷带，擦伤口，喂饭喂水。一连四天四夜，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徐海东的生命夺了回来。第五天，徐海东终于醒过来，问守在身边的周少兰：“现在几点？部队该出发了吧？”周少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还出发呢！四天四夜不省人事，把人都急死了！”徐海东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后来徐海东对她说：“没有你，我徐海东就不存在了。少兰同志，你改名叫‘东屏’吧。”东



在我们皖西霍邱县岔路镇，有一句俗话说：“老娘人是簸箕，成人之美就过去。”去浮存实是簸箕这种农具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为人处世哲理的启示：媒人从中牵线搭桥，完成了光荣使命，男女结为秦晋之好，步入婚姻殿堂。在农人的记忆中，簸箕是件最普通的农具，每一个庄户人家，无论生活富裕还是困窘，都离不开簸箕这个日常生活用品。

《礼记·学记》中云：“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簸箕三面有沿儿，一面敞口，周边凸起，一般用柳条或竹篾编成。簸箕的制作颇有功夫，柳条要经过脱皮、蒸晒、浸水、捂软、编扎、缠边等多道工序才可成形。“柳树，柳树，庄前屋后，绿色一片，村庄守护。”这是我们这里的顺口溜，柳树成为村庄忠实的朋友。一节节新鲜的柳条，经烈日刺痛，历风霜侵蚀、火光烘烤、时光浸渍后，才有了柔软的筋骨和阔大的承载胸襟。

乡村广袤的土地上，滋养了一大批能工巧匠，我们这里统称为“编匠师傅”，无论是柳编还是竹编，都是乡村永不褪色的风物。阳光像一朵盛开的花，编织师傅浸润在柔和的阳光下，不急不躁，有条不紊地左插右穿下，柔细如丝的柳条华丽转身，变成了经纬缜密、变格匀称的簸箕，玲珑精致，凸显了编匠师傅的心灵手巧。

一根柳条从芬芳水泽转身走进农户，簸箕繁杂轻浮，留下丰裕厚重，去完成一个个新赋予的使命。世间万物，无论大小，皆有其独特之美。小物件亦能展现大用途，彰显皖西人民无尽智慧与创意。

唐·刘禹锡《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诗经·大雅·生民》：“或舂或揄，或簸或蹂”，这个“簸”，也就簸米。簸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振荡，摇动”。杜甫《复阴》诗：“江涛簸岸黄沙走，云雪埋山苍兕吼。”就是颠簸簸簸的意思。

“簸”，看似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是一种很吃功夫的技巧活。乡下人簸簸箕时，先把粮食置于簸箕中，双手端着簸箕不停地晃动，粮食随着簸箕上下颠簸，三五下之后，杂物和尘土就渐渐地与粮食分开，轻浮之物在中间“旋涡”中无立足之地，滥竽充数躲不过正义的审判，朝簸箕的嘴边移去，再一扬簸箕口，粮食里的尘土和秕子飞出簸箕，饱满的谷物则留下来，经得起“颠簸”审阅与检阅。

我初学簸簸除杂之物时，手端不平，我们家有条谚语：“用力不均匀，簸箕不平衡，饱满难分清。”簸簸箕要做到身子摆正、心态放平，这何尝不是为人处世的哲学课？簸箕是扬米去糠的工具，与生俱来的职责是筛选。筛掉的是虚浮的、伪劣的、质次的秕谷，留下的是诚实的、饱满的、优质的果实。

《世说新语》里记载有这样一件事：东晋时期，司马昱邀请王坦之和尚范固前去议事。范固、王坦之两人互相谦让，都让给对方走前头。推让半天，最终王坦之走在前面，他说了一句“簸之扬之，糠在前”，而范固听后立马回了一句“跳之汰之，沙砾在后”。在这个故事里，簸箕的原理被双方巧妙地拿来表达自己的谦卑，两个人相互礼让，都以对方为尊，因而气氛和谐融洽。

《诗经》中的“斗”和“箕”不仅表示容器，还表示古代的星宿。“斗”是北斗七星也就是勺子星，“箕”表示“箕宿”，二十八星宿之一，为东方最后一宿，古人崇拜天象，箕星一旦特别明亮就是起风的预兆。这句诗意思是：南边有箕星，但不能用它簸糠；北边有斗宿，也不能用它舀酒。用天上星宿与人间实物作对比，可能另有意义。说明“簸箕”这个实用器具当时已经在使用了。

前一段时间，看见草楼村一户农家院子里，簸箕里放着饱满无杂质的菜籽种。老人家近八十岁，脊背微微佝偻，头发花白，还能种菜，多余的菜用三轮车载到集市去卖，看着簸箕以及簸箕里留下的菜籽种，就看见田间地头扬场簸箕劳作的身影，那么亲切，一如看见远去的岁月里，我的乡村人们执着坚守，坚守在那一片世代代耕耘的土地上。

簸箕也是一首乡村谱写的岁月歌谣，这簸箕簸着簸着，簸弯了母亲的背，簸白了她的头发，也簸走了我的父亲，还有一些亲人们……时代在变革，簸箕已在时光中凝固成记忆的标本，日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智慧是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簸箕，成为农业生产的厚重历史见证，承载着生产劳动的艰辛与光荣，启示着我们更加坚定从容，求真务实，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地簸一簸自己，簸去思想上的尘埃，清除心灵上的杂草，活得堂堂正正。

簸箕跳动的乡村

张正旭

红土地

本版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